

“钓鱼宴”:宋朝公务员的开卷考

在宋朝,公务员晋升有一条“捷径”,那就是诸多文人士子做梦都想参与的“钓鱼宴”。每当阳光明媚的日子,皇帝经常会召集一定级别的官员到皇宫,在亭台水榭间赏花、钓鱼、赋诗、习射,大家戴官花、品佳酿,会桃李之芳园,序君臣之乐事。

何为钓鱼宴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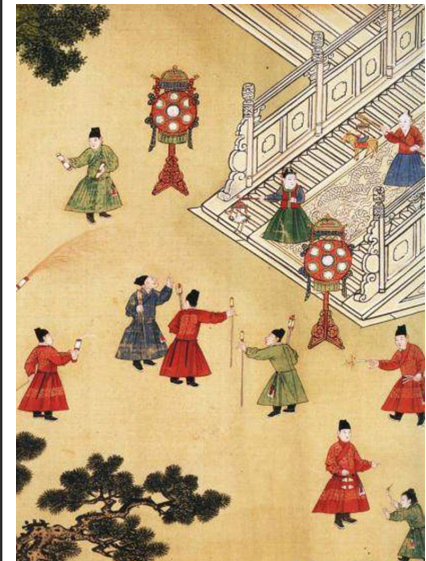
“钓鱼宴”也叫“赏花钓鱼宴”,是皇帝牵头举办的大型文娱活动,好似“宫廷春晚”。宋太祖“陈桥兵变”取天下后,经常召来自己亲近的官员,赏花习射于宫苑之中,这是钓鱼宴的最初发端。不过,当时参加的人数不多,规模不大,不定期,也很随意。雍熙二年(985年),宋太宗正式把钓鱼宴参加的人员、规模、程序确定下来,作为朝廷定例,年年如期,“雍熙二年四月二日,诏辅臣、三司使、翰林、枢密直学士、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、三馆学士宴于后苑,赏花、钓鱼,张乐赐饮,命群臣赋诗习射。赏花曲宴自此始。”

那么,宋朝皇帝为什么要年年举行这样的文娱活动呢?简单地说是试才华、拉关系、稳政权。立国之初,人才是本,除了开科取士之外,领导层又想出这一招,在赏花赋诗中吸引人才、发现人才、提拔人才。同时,宋朝取后周而代之,大多数官员都是后周旧臣,有许多心理与礼制层面的问题要解决,君臣有隙,邦国不宁,提高部下的向心力、构建新的上下级关系、维护核心权威,是朝廷当务之急,正如后来宋孝宗与大臣们交谈时所说:“祖宗时,数召近臣为赏花钓鱼宴,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饮宴……君臣不相亲,则情不通。早朝奏事,止顷刻间,岂暇详论治道!故欲与卿等从容耳。”(清代毕沅《续资治通鉴·卷一百四十二》)要稳固皇权,必须把官员们牢牢捆绑在自己的周围,形成稳定的上下级关系,钓鱼宴恰好提供了这个平台。

钓鱼宴年年举行,一批人才从这个“宫廷春晚”中脱颖而出。据宋代孔平仲《谈苑·卷四》载:“赏花钓鱼,三馆惟直馆预坐,校理以下,赋诗而退。”宋太宗规定,钓鱼宴中,三馆(昭文馆、集贤院、史馆)官员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才能赋诗参宴,如果是校理以下级别的只赋诗不参宴,把诗交上去就走人。集贤校理李宗谔因为不能参加宴会,赋诗道:“戴了官花赋了诗,不容重见赭黄衣。无繆却出金门去,还似当年下第时。”内心不平,颇有牢骚。谁知,宋太宗阅后却惊异于李宗谔的才华,非常高兴,“特诏预宴,即日改官。”不仅特批他赴宴,还马上提拔。其他宋朝大文人如杨亿、姚铉、王禹偁等,或通过钓鱼宴引起皇帝的注意,或通过钓鱼宴博得皇帝的垂青,都得到了重用提拔。钓鱼宴,成了皇帝网罗天下人才的宴会。

不是所有的钓鱼宴都开卷

十年寒窗,读书破万卷,还只弄个进士出身,陪皇帝钓一次鱼,赋几句诗,就能连升数级,一步登天,无异于一本万利,这让大家对钓鱼宴趋之若鹜,都希望在钓鱼赋诗中,把自己最优秀的一面表演给皇帝看。参加钓鱼宴也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,那些曾经在禁苑陪皇帝钓过鱼、赋过诗的,更是以此为荣,到处宣扬。即便是欧阳修、范仲淹、司马光这样的政治家、文学家,也会在致友人的书信或诗歌中反复提及和咏叹,得意之色溢于言表。



钓鱼宴一般都会提前确定举行的日期和赋诗的题目,先让大家准备准备,如同公务员的开卷考试。每当通知下发之后,无论是学士翰林,还是六部首长,纷纷对着诗题,挑灯夜战,撕了又写,写了又撕,不厌其烦,直到自己满意,然后背得滚瓜烂熟,了然于心。到了那天,大家峨冠博带,踱着方步,一个个踌躇满志。因此,每次钓鱼宴所献的诗歌都清一色地工整,而且不跑题,不走调。

当然,也不是所有的钓鱼宴都开卷,开卷考试有时候不仅试不出真才,也试不出真心。宋仁宗天圣八年举行钓鱼宴,宴前本来已经把诗题通知了大家,恰巧当时地方上进贡一批“山水石”,宋仁宗灵机一动,取消了原定题目,改用“山水石”为诗题,这下可把那些诗歌准备得好好地大臣们弄得手足无措,半天找不到感觉。大家抓耳挠腮之际,宫廷优人(以乐舞、戏谑为业的艺人)还出来戏弄大家,手拿毛笔做吟哦状,其中一人假装被石头绊倒在地,众人扶起后,他叹息道:“累日来作一首‘赏花钓鱼诗’准备应制,却被这石头擦倒。”(宋代阮阅《诗话总

龟·卷之四十八》)大家笑也不是,不笑也不是,表情十分尴尬。这次,整体诗歌水平较以往大幅下降,其中,度支员外郎、秘阁校理韩贇更是行为鲁莽,诗歌粗俗,被评价为“鄙恶”,惹得宋仁宗震怒,马上升其为司封员外郎、同判冀州,把他赶出了京城。看来,钓鱼宴也不能保证人人都有好运气。

钓鱼宴不仅要赋诗,当然还得钓鱼,但在皇宫禁苑钓鱼,既无太公的坦然,亦无村夫的闲适,禁苑钓鱼有严格的程序和纪律,简而言之:“天子未得鱼,侍臣虽先得鱼,不敢举竿。”(宋代司马光《涑水记闻·卷第三》)意思是皇帝没有钓到鱼,大臣们即使有鱼咬钩,也不得起竿。而且皇帝钓的鱼要用红丝网装,大臣钓的鱼只能用白丝网

网,丝毫不能乱套。有一次钓鱼宴,宋仁宗钓到鱼后,大家纷纷道贺,侍从用红丝网帮皇帝装好。接着,宰相中有得鱼者,侍从用白丝网装好。这时,尚书左仆射兼侍中(首相)曹利用得鱼,侍从用红丝网为他兜鱼,他居然不推辞。曹利用平时就居功自傲,又做出这种出格事,更让上上下下侧目而视。不久,不可一世的曹利用获罪被贬,先贬随州(今湖北随州),再贬房州(今湖北房县),连连降职,深感屈辱的他,最后在去房州的路上,用一根绳子了却了自己,真是伴君如伴“钓鱼翁”,在皇帝身边,即便是钓鱼这种娱乐活动,也如走钢丝一样凶险。

本报综合消息



古人购物的支付方式

最早的购物场所“集市”起源于商周时期。《易经·系辞》里记载:“日中为市,致天下之民,聚天下之货,交易而退,各得其所。”中午开市,有买有卖,各取所需,这应是古代购物节的最早雏形。

查阅现存史料可知,集市一般设在人口密集处,每周开市一次,方便居民购物。消费者也会提前将所购之物列出清单,放在荷包里随身携带。唐代以后,商品经济空前发展,市民购物需求不断增长,集市规模进一步扩张,政府为此设置“市令官”专职管理市场交易,形如今天的淘宝客服,维持市场秩序,调节买卖纠纷。

汉朝以后,从汉武帝开始铸币权收归中央,民间铸币被视为非法,当时的“五铢钱”是汉朝唯一的合法货币。秦汉时期的铜币,“半两”或“五铢”都是钱的重量(二十四铢为一两),这一做法在唐朝后有所改变。

据《旧唐书·食货志》中的记载:“(唐)高祖即位,仍用隋之五铢钱。武德四年七月,废五铢钱,行开元通宝钱,径八分,重二铢四累,积十文重一两,一千文重六斤四两。”这就是说,唐高祖李渊改革币制,钱文不再强调重量而改用“通宝”,这种做法也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。

宋朝以后,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,铜币铸造进入高峰期。据统计,北宋时期大约铸造了2.5亿贯铜钱(每贯一千文),远远超过其他朝代,大概也只有清朝才能与之相媲美。

明朝起,银两与铜币并列为主流法定货币

铜币以外,中国古代也曾铸造过铁钱,不过应用面远不如铜币。此外,在明朝尤其是张居正推行“一条鞭法”后,银两开始成为与铜币并列的主流法定货币。之所以采取银两作为主流货币,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海外白银大量流入,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铜币价值低,不利于商品交换,尤其是长途贸易,而金币的价值又太高,同样不适合交易。

明清时期,货币流通模式大体以银为主、以钱为辅,或者也可以称之为“银钱混合制”。在实际生活中,这一模式往往体现为“大处用银,小处用钱”。也就是说,在大宗贸易或者购买贵重物品时通常使用银两结算,而一般日常生活比如买菜、喝喝茶,一般就用铜钱。否则的话,携带一个大元宝去吃饭,不说裤兜吃不住这小四斤的重量,就是去了饭店,那主人也没法找零,因为一锭大元宝几乎能把店里所有东西都买下了。

事实上,日常生活中使用银两也很不方便,因为银两有银饼、银锭、银元宝、零碎银子等各种形制,使用时既要称重,又要看成色,非常麻烦。而且,由于是银、钱双轨,其中的换算就很重要了。明朝诗人何景明在《岁晏行》中说,“白金纵有非地产,一两已值千铜钱。”这说的是白银一两可兑换成一千文铜钱。当然,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区,这个兑换率有所不同,有时波动甚至达到一两倍。

清朝的铜钱又叫“制钱”,一枚制钱是1文钱,1000文又称“吊”或“贯”。按官方规定,1两银子应兑换1000文。但在民间,银价和钱价一直在变动,如清初制钱投放不足,1两银子只能兑换800制钱;乾隆朝以

后,银价上涨、铜价下跌,1两银子就不止兑换1000文了;道光朝时期,由于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,1两银子甚至可兑换2000文以上;而晚清时期,1两银子兑换的制钱数一般在1100文至1800文之间徘徊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从明朝中后期开始,外国银元如墨西哥鹰元等开始流入我国。由于外国银元形制规范、价值稳定,因而在沿海一带很受欢迎。受此启发,清末时期清廷户部和各省也纷纷铸造银元、铜元,而由此带来的铸币税收收入对各省新政如练新军、办教育等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。

过多铸造铜元带来通货膨胀

尽管不能与滥印纸币相提并论,但过多的铸造铜元同样会带来通货膨胀。据统计,1905年时全国已有17省开铸铜元;至1907年时,各省铸造铜元多达124亿枚;1910年时,流通市面的铜元价值已达1亿两,这还没算上国内外私铸的铜元。相对应,清末十年的物价较以往也有明显上涨。

作为金属货币,铜元带来的通胀和纸币相比只能说是“小巫见大巫”。一般认为,北宋时期的“交子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纸币。“交子”最早出现在四川,由成都十多家富商联合发行,它既可以在市场上使用,也可以到“交子铺”兑换现钱。宋仁宗天圣元年,“交子”改由政府统一发行。南宋时,“交子”改称“关子”“会子”,但由于发行量过大而导致持续贬值。

元朝时期,虽然也曾铸行过少量铜钱,但当时主要以宝钞为流通货币。这种以纸币为主的朝代,在中国古代是十分罕见的。最开始时,宝钞发行量有严格限制,但没有持续多长时间,元朝统治者即滥发纸币来弥补开支,最终物价飞涨,重蹈覆辙。明朝初年,朱元璋也曾推行“大明宝钞”,但抑制不住的发行量和遏制不了的通胀贬值,最终让大明宝钞不了的了之。

清朝时期也发行过纸币,最开始是顺治八年(1651年)发行“钞贯”,10年后废止;后来在咸丰三年(1853年)时,因为太平军起义,清廷银钱两断,风雨飘摇,不得已而发行“大清宝钞”和“户部官票”。然而,在完全没有后备金的情况下,所谓“大清宝钞”“户部官票”几乎没有信用可言,推行不到两三年后即沦为废纸,之后即被清理,不再使用。直到20世纪30年代,国民政府强力推行法币,实行了三千多年的金属货币才陆续退出流通市场。之后,中国也真正进入了纯粹的纸币年代。

本报综合消息



古人购物如何付钱?

和现在相比,古代的货币形式混杂,支付方式可要麻烦多了。

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,由于交易需求比较有限,因而多是“以物易物”为主。直到后来,才产生了交换的中介物——货币。据考古学家发现,很多国家多采用海贝作为原始货币,中国古代也是如此。随着商品交换的不断扩大,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,由此产生了人工铸币。

或许是冶炼技术要求不高的缘故,多数国家不约而同采用了铜作为货币的主要原料。譬如中国的商朝就是用铜仿制海贝,而铜币随后历经各朝各代,使用了三千多年。春秋战国时期,国内的铜币铸造开始进入成熟阶段。当时,像“春秋五霸”“战国七雄”都铸有铜币,其中又以赵国的铲币、齐国的刀币、秦国的圆形方孔钱、楚国的蚁鼻钱比较出名。这些铜币,至今时有发现。

秦始皇灭亡六国后推行统一政策,所谓“书同文、车同轨”,货币也是一样,“以秦币同天下之币”。之后,原通行于秦国的圆形方孔钱被推广到全国,这就是所谓的“半两钱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由秦朝“半两钱”确定的“圆形方孔”的铜钱形制,一直沿续到清朝。